

绘声绘色，娓娓动人

——黄宗英散文的艺术特色

刘 景 清

六十年代以《小丫扛大旗》、《特别的姑娘》、《新洋伯》等作品誉满文坛的黄宗英，近几年来，创作激情有如山泉奔涌，接连发表了十多篇散文（包括报告文学）。这些作品，以它的艳丽色彩和独特风姿，争艳斗妍于散文园地，赢得了读者的注目与喜爱。

散文，是文艺中的轻骑兵。它题材广阔，形式自由，笔墨多样，不拘一格。从一物之微到掀天巨浪，从感情的一星火花到知识的丰富海洋，从山川景物到人情世故，都可形诸笔端，创作出隽永动人的散文作品来。它跟现实生活保持着最广阔、最直接的联系。因此，散文的园地，也应该是更其多姿多采、绚丽夺目。浏览当代一些有成就的散文作家的作品，有的以思想精粹见长，有的以气势雄浑著称，有的以诗意浓郁取胜，有的以玲珑剔透怡人，有的以知识丰富独树一帜，……那么，黄宗英的散文创作的最突出的特点又是什么呢？

我认为，人物形象鲜明生动，是她散文的突出特点，也是她在散文领域独标一格之处。

从题材内容来看，黄宗英的散文大致可分为两类：一类是以深挚的感情，讴歌、怀念领袖、英雄、友人，如《《天上人间》、《美丽的眼睛》、《星》、《槟榔妹妹》；一类是以浓重的笔触，反映祖国面貌的巨大变化，报告先进人物的英雄业绩，如《大雁情》、《抖抖肩立大志》等。但是，不管哪一类，又几乎都是真人真事。因此，作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，努力反映出生活的真实面貌，刻划出对象的真实性格来。

《星》是一篇追忆、悼念上官云珠的散文。作者和上官云珠从四十年代登上舞台、银幕，相处三十余年，虽“说不上是莫逆之交，却也算得是知根知底的”。唯其如此，才不会过分护短，也才能真实地写出上官的本质特征来。这类作品，一般以感情真挚深切见长。

“四人帮”的“全面专政”和法西斯专制，使多少人惨遭迫害，多少骨肉至亲、友好同窗形同陌路、生死悬隔！这种长期压抑的真实感情，一旦冲破堤防，就如江河横溢，奔腾漫流。

《星》不仅选材精当，以微知著，而且感情饱满，一颦一笑，自然真切，都能牵动读者感情的丝缕。尤其值得称道的，它不仅叙事、抒情，而且勾勒了上官云珠的鲜明形象。作者说上官“巧于酬酢，又率直得惊人，谁要惹着她，她可是厉害极了；她若同情起人来，却是拔葵倾囊，肝胆相照”。这种艺术家性格的概括，被作者绘声绘色地描写的一件件“琐事”，如拒绝“慰劳空军将士”演出，帮助国民党空军人员起义，怎样“吃定这碗戏饭了”，深入生活特制的“上官袜”等，表现得形神毕肖、跃然纸上。这使我们对这位饱经沧桑的优秀电影表演艺术家有更真切的了解。

《大雁情》是一篇报告文学，写西安植物园的助理研究员秦官属同志，怎样受尽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迫害，被迫放弃自己的专业，转而种植野药，作出了出色的成绩，但是至今还

处境困难，受人非议。作者在文章里称：“报告文学一般以表现先进为主，写出主要人物先进的一面。”她的这篇报告文学也是这样做的：写了秦官属许多先进事迹。但是，作者不以此为满足。秦官属之所以先进，全在于她思想性格的美。因此作者努力“从普通中找一找这一代科学工作者的缩影”，去挖掘先进人物的性格美。在作品里，秦官属的“直率泼辣的性格”，描绘得相当鲜明生动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她越批越不服；有人要砍树，她往前一站，大喊大叫：“谁敢锯这杨树种就先锯了我！”一言不合，她一语不发，把晾干的衣服叠了又叠，拉了又拉，压了又压；一言触到伤心处，她竟“头也不回，‘登登登’地奔下山去”……这样，就赋予先进事迹以性格的光彩，使它跟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起留在读者的记忆里。

谁说散文创作不能或者不必刻划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呢？请读一读黄宗英同志的作品，对开阔我们的视野大有裨益。诚然，散文的品种和样式很多，一律要求它象小说戏剧那样塑造人物形象，是不切实际的，也不利于散文的百花齐放。但是，刻划人物形象，也应该是散文创作的重要任务。有的作品，写景状物，如身历其境；抒情议论，则娓娓动听，然而勾勒性格，不免相形见绌。这必然会减弱作品的艺术感染力。在散文创作中努力刻画形象，不仅可以多一副笔墨，提高艺术表现力，而且可以提高作品的艺术境界。

黄宗英的散文不仅刻划了描写对象的鲜明性格，还表露了作者自己的生动形象。它不象一般的散文作品，“我”仅仅作为结构作品的线索或描写对象的陪衬。“我”是一个有性格的爱憎分明的人物。在《星》中，“我”起先瞧不起上官，尔后又怎样改变了成见，在拍片时，“我”怎样“高高兴兴”地跟她交换角色；而解放后看她第一个演了兵，又怎样跟她“紧紧握手拥抱”，“狠狠捶了她几拳头”。在《大雁情》中，“我”这个特约记者会跟一群女同胞交换着吃“各自背囊里的杂食”，会跟一群山村姑娘讲“文化界的生活”，会由于“一肚子火”，对一个负责干部“粗声粗气”地说话。这些作品中的“我”是一个统一的性格，跟作品主人公一起，成了作品所要揭示的生活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。这样表现，自然贴切，毫不矫揉作态，读者读来也亲切熨贴，有身临其境之感。

然而，散文刻划形象，既不能象戏剧那样凭借贯穿始终的冲突，又不能象小说那样依靠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。特别是报告文学，作家没有凭想象去作心理描写的自由。黄宗英的散文作品刻划形象，更多地是通过动作和细节的描绘来实现的。

《大雁情》写到人们对秦官属看法的分歧，焦点之一是从领导到群众都有人认为她群众关系不好，“脱离群众，脾气极坏，骄傲自大，特爱吵架撒泼”。作者是怎样揭示秦官属群众关系的底蕴的呢？前后用了四个动作和细节。刚到洛南县，秦官属来接“我”，“我”就提醒她：“你现在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，地位和从前不同了；你应该注意群众关系……”秦官属却“默默地折叠晾干的衣物，叠了又叠，拉了又拉，压了又压”；她“一语未发，取出一盒烟，拿了一支递给我，漠然地看了我一眼”。通过这些动作，准确地表达了她内心的语言：不同意“我”的忠告，但因“我”是新结识的朋友，不愿冲口而出而已。又仿佛在说：何必多费口舌，让事实来说话最有力！这是从反面所作的铺垫。接着通过动作和细节正面来揭示。一是在县城的当晚，“耳边，听着东厢房老秦和青年们融洽无间的谈话声……我的思想飞得很远很远。”这是从“我”的感受来写，是巧妙的暗示。接着到了谢底大队，作者用富于诗意的笔触，写从山顶上飞下来一个小女孩，一头扎在老秦怀里，又飞下来一个小男孩，抱

住了老秦的腿；写老秦怎样被他们拽进了家，孩子的妈妈怎样把“三亲六邻家里屋外的事一嘟噜一嘟噜地往外端”；怎样留不住老秦吃饭而“气咧咧”地把柿饼往老秦书包里塞，粉蝴蝶般的小姑娘又怎样把一小篮蒸糕放在老秦的床头柜上。后来，“我”又偶然问孩子们：“你们长大了，干什么啊？”孩子们回答：“象秦姨那样嘛！——”作者感慨道：“秦官属同志在山区培植成功的岂仅是药材……”就这样，作者从反面、从正面、从自己的感受到亲眼目睹的几个动作和细节，成功地点染了秦官属的如鱼似水的群众关系，解开了自己心中的疑窦，驳斥了对秦官属的曲解和偏见，从而也轰然矗立了秦官属鲜明生动的形象。

动作和细节富于表现力，黄宗英同志不仅擅长于通过动作和细节刻画性格，而且还常常使动作和细节带有戏剧性，使之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。如《赛得好》中程庆云声言要去腰庄探舅子的细节。这是十多年来的稀罕事，他爱人为他准备新鞋，还把消息带到田头，人们干活时还“捎看路头子”，故意渲染戏剧环境，结果大出意料，庆云却在家里编畚箕。戏剧性使得细节活了，性格更突出了。如《大雁情》， “我”与秦官属相见，以为她是个年轻姑娘，她一回头，才发现两鬓已霜；“我”正要个别采访，想跟她细谈，她却留下一张纸条，“请求你们千万别找我。我的处境很为难，望你们谅解。”通过细节设下一个个悬念，使文势跌宕，引人入胜。让读者欲罢不能，非要探个究竟不可。

散文创作的特点之一，是笔墨放纵，形散而神不散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，其刻画性格比小说、戏剧难度要高。如果笔墨过于放纵，如脱缰的野马；事无巨细，如流水账目，形象性格就不可能鲜明突出。因此，散文作品更要注意结构和剪裁。构思精巧，剪裁得宜，是黄宗英散文创作的又一特色。

《美丽的眼睛》是写烧伤面积百分之百的病人杨光明的。这对于病员和医护人员来说，都是一个奇迹。因此，可以从各种角度去写，而且都有意义。但是，作者只取杨光明的“美丽的眼睛”的“特写镜头”。作者说：“从有生命力的事物中去发现美，是作家的职责”，“眼为心之苗”。她认为杨光明的眼睛是最美丽的，“从杨光明的眼睛，我看到了她美丽的心灵；从救活杨光明这一件事，我看到了祖国的心灵”。这样的构思，角度新，不落旧套，既能恰到好处地表现主题，又符合杨光明的实际情况。的确，杨光明身上，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，只有那双眼睛是最美丽的。按照这一构思，围绕着眼睛来组织细节：她从昏迷中醒过来，说的第一句话，就是“眼……睛……，保住……我……眼睛……”；她睁开眼睛，看到镜子里自己烧伤的面容，伤心不已，但愿“从此不再睁开眼睛”；而当她看到她爱人的“永远忠实于你”的情柬，含泪的眸子又“渐渐明亮了”；在医护她的日日夜夜里，她眼睛里洋溢着深情：“只记得医生、护士、阿姨，清瘦下去，清瘦下去。”通过这一双眼睛，我们的确看到了杨光明心灵的美，社会主义的美。

《星》写了电影表演艺术家上官云珠的一生。如果面面俱到，那真要不知从何说起。其构思的精巧，在于从星开始，人们称有声望的演员为“明星”，而上官云珠就是一颗“曾经闪烁过光芒，却又消逝了的星”；至星结束，云中之明珠，就是星，而这颗星是永恒的，“即使撞成碎块，也还是会沿着天体运行的轨道在前进的”。其剪裁之得宜，在于围绕“明星”做文章。一个演员的艺术生涯，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：在旧社会，怎样受尽污辱、损害、压抑；在新中国，怎样得到领袖和人民的尊重、关怀，在艺术实践中发挥才能，改造思想，被“革命的洪流推拥着”向前走。但想不到，这颗明星竟在“四人帮”摧残下碎裂

了。抚今思昔，历历在目，感情油然而生，形象也就血肉丰满了。

构思精巧，剪裁得宜，使黄宗英的散文不蹈旧辙，既不与别的作家的作品面目雷同，自己的作品也是一篇一个样，总有新鲜感。《天上人间》连用三句“你没有注意么？”作三段的开头，然后写了淮安的那块断石残碑，淮安上空的飞鸟，淮安上空的云彩，用这些富有典型意义的场景，来抒发淮安人民对总理的深挚感情。《大雁情》的几个小标题，更是别开生面。全文五节，用了五个“她”作标题，凡作者写她亲眼目睹的秦官属，则用“她”，完全是肯定的语气；凡听到别人的议论、指责、诬蔑，则用“她？”或“她？”，是疑问，也是否定。五个内容不同的“她”，反映了文章内容的层层递进，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立场和强烈的爱憎。于细微处见精神。这些地方，都可看出作者构思的匠心、艺术的工力。

任何文学作品都是语言的艺术。“言以文远”。语言的精湛，文采的斑斓，对于散文创作十分重要。黄宗英的散文刻画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，也得益于她驾驭语言的娴熟技巧。

黄宗英散文创作的语言特色，一是激情充溢，一是富于个性特点。

黄宗英叙述事件、描写人物，总是带着丰富的感情、热烈的爱憎。如《星》所表现的作者对上官云珠的感情是真挚的、热烈的，其间有同情、友情、真情。写到她们合演《丽人行》时，上官哭得不可开交，触到了她的伤心事。“旧社会，哪个演员没留下过这样那样的心灵的创伤……”饱含着作者深沉的同情。写她们上山下乡，上官特制“上官袜”相送以御风寒。“从那年起，我下乡都要捎上这种袜子”，流露着姐妹间真挚的友情。写她们演出的《乌鸦与麻雀》得奖，上官发言说：“我没想到周总理这样尊重我们的工作。”“‘尊重’两字一出口，她就红了眼圈。”体现着多少蕴藏心底的真情！这样饱蘸感情的笔墨，最富有感染力，是读者最好的向导。它引导读者走进作者布置好的艺术境界，在感情上产生共鸣。从而爱作者之所爱、恨作者之所恨，在潜移默化中加强了对人物的印象。

如果说激情是散文创作的生命，它并非黄宗英作品所独有，那么，语言富于人物的个性特点，则在散文创作中所少见。在一些散文中，偶尔写人物对话，往往考虑正确表达一种思想、阐述一个哲理、创造一种意境多，而是否切合人物的身份、性格，常常被作者所忽略，或者说，不如小说、戏剧那么严格。无疑，这会影影响形象性格的鲜明性。而在黄宗英的笔下，语言有个性特征，因而也有生活气息，使人觉得真实可信。她笔下的知识分子的语言与农民的语言是不一样的，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、农民与农民之间也因性格不同而语言相异。如同是知识分子的形象，上官云珠的语言就与秦官属的语言不同；同是农民的形象，程庆云的语言也跟于永生的语言不一样。语言因人而异，正是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的一个基本原因。

这不仅是技巧问题，更主要是生活基础问题。作者的创作态度是认真严肃的，写人叙事，都不靠浮光掠影、道听途说，事事必作深入的调查研究，环境再艰苦也不踌躇却步。作者自称要“争当一名战地记者”，“战地记者”是要深入前线，浑身带着硝烟火药味的。也只有这样深入下去，才能触摸到人物脉搏的跳动，了解到人物性格的底蕴，才能把人物形象写活。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有了这样坚实的基础和严肃的态度，创作就能一步一层楼。我们期待着黄宗英同志的散文创作出现更新的面貌，用“如椽采笔，描绘百花齐放的春天”。